

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	江文汉(1)
帝国主义侵华缩影的怡和洋行	张 锐(26)
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对外电信交通	荣宝澧(53)
有关上海兵工厂的回忆	陈修和(63)
永利硫酸亚厂建厂经过	邵秉文(86)
天津永明漆厂简史	陈调甫(101)
丹华火柴公司沿革	张新吾(111)
书甲辰三暗杀案	章士钊(130)
书吴樾狙击五大臣事	章士钊(136)
黄埔革命同学会回忆	黄 雍(140)
黄埔同学会始末	曾扩情(151)
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幻想	周亚卫(170)
关于“合步楼公司”的片断	黄培正(172)
局外局中人记	陈曾寿 陈曾植(174)

附注

对《有关上海兵工厂的回忆》一文的更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

江 文 汉

基督教传入我国,前后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最早的是唐朝时(公元六三五年)传入我国的“景教”,其次是元代盛行的“也里可温教”,但后来均告失传。十六世纪末,天主教传入我国,一八〇七年,基督教(新教)也开始传来。鸦片战争以后,它们都利用了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传教特权,深入我国内地。从信徒人数来说,我国天主教徒要比基督教徒多;但是基督教(新教)很着重办“教育事业”和“社会事业”,因此基督教在我国的社会影响,可能比天主教还要大些。

过去,我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均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和利用,一贯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先锋和助手,我国广大人民称它们为“洋教”。到解放初期为止,它们的活动,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是分不开的。它们所办的一切事业,不管是披着什么“仁爱”、“友好”与“慈善”的外衣,都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我国人民的工具。国外派来的传教士,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伪善的表现,都是执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帝国主义分子。多少年来,我国善良的信徒受了他们甜言蜜语和小恩小惠的蒙蔽,以致是非不明,认敌为友。我自己虽然并不是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但从小就受着基督教的影响,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到留学美国,都受的是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大学毕业以后,即参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以下简称青年协会)工作,至今已整整三十年,现仅就基督教青年会

(以下简称青年会)在中国所进行的活动,根据个人的了解和经历,作一概括的叙述。

青年会的历史背景

青年会是英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最初由英国商人乔治·卫良(George Williams, 1821—1905)于一八四四年创立于伦敦。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许多青年从农村流入城市,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作时间很长,居住条件很坏,生活极其苦闷,普遍地表示不满和反抗,就在这种情况下,乔治·卫良邀集了十二位青年店员,组成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声称以宗教活动来改善青年们的精神生活。这种组织很快得到资本家的支持,不到六七年,遍及英伦三岛,随后还出现在欧美各国。一八九四年青年会举行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英国女王认为乔治·卫良有功,授以勋爵。

青年会虽然起源于英国,但在美国最为发达。一八五一年青年会从英国被介绍到美国以后,就逐渐从一种单纯以宗教活动为号召的青年职工团体,发展成以“德、智、体、群”四育为标榜的社会活动机构。并且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扶持下,建立庞大的会所,聘用专职的干事。它就成为推行“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

一八五五年欧美各国的青年会在巴黎举行第一次的国际性会议,组成“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World Alliance of the Y. M. C. A. S. 以下简称“世界协会”),并于一八七八年正式设立办事处于日内瓦。青年会现已分布在六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会员约计一百七十多万人。世界协会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来自美国;自一九二七年以来,总干事的职位一直是由美国人担任,所以世界协会和美帝国主义的控制是分不开的。

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美国殖民主义势力向外扩张,美国教会上层曾掀起一个国外“传道”的热潮。他们号召美国的青年担负起“白种人的责任”(“White man's Burden”),立志去东方“未开化”

的民族当中“传道”，要求“在这一辈子把整个世界基督化”（“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实际上是要在宗教的掩护下，使全世界美国化。一八八九年，美国和加拿大的青年会联合组成“北美协会”，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就是通过北美协会的头子穆德（John R. Mott, 1865—1955），把青年会向外扩张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他们在这些国家内，盖了许多美国式的会所，连建筑材料和室内设备都是从美国购置的；并派了许多美国干事，担任关键性的职务。按照北美协会所宣布的原则，没有邀请，是不派遣干事到别的国家去的。从一八九五年起，他们派到中国来的美国干事，据说是根据在中国的传教士所出面敦请的。

穆 德 这 个 人

穆德是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个颇有“名气”的人物。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直接扶持下，他在国际基督教界曾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不但是北美协会的首脑，他在一八九五年发起组织“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以下简称“世界学盟”），还前后担任过这个组织的总干事与主席的职务。他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七年充任青年会世界协会的会长，企图通过这些组织，将世界各国的知识青年统治在美国的影响之下。为了进一步使美国在整个传教事业中取得全面控制的地位，配合美帝国主义独霸全世界的阴谋，他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又于一九四八年促成“世界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成立，由他分别担任主席与名誉主席。英美资本主义国家把穆德捧得很高，说他是什么“世界的公民”，“基督的大使”，“近代的保罗”（按：保罗是一世纪时将基督教从犹太传到外邦的使徒）。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我在美国纽约参加过为庆贺穆德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大

宴会，餐费每人十块美金，顾维钧出席致祝词。我们知道，诺贝尔是十九世纪末瑞典军火商人靠剥削旧俄时代的巴库油田而发了大财的。

我在纽约看到穆德时，他已经是八十一岁的人了。虽然名义上他已退休，但还是忙着策划一切。他对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基督教面临着向世界扩张的大好机会。中国是具有很大的“战略”意义的；他到过中国六七次，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传教工区，四万万人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他不能“忘怀”中国。他告诉我美国的教会已经安排了一个战后世界性的“复原与扩张计划”。他主张派遣一百个年轻的美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做学生工作。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上海解放前夕，他在去日本向日本天皇传教的途中，还特地在上海停留一天，召开一次传教士和中国教会领袖的特别会议，给大家在准备应付新局面到来时打气，并保证西方的教会继续支援中国教会。

从穆德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什么奉了上帝的名，将福音传遍全世界，而是奉了美帝的指示，在煤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汽车大道奇(C. H. Dodge)、百货公司大王华纳麦卡(John Wanamaker)等垄断资本集团的直接扶持下，来对全世界进行所谓“精神扩张”。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日，在穆德的策划下，北美协会在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府举行了一次“青年会世界扩张的计划会议”，邀请了二百多位大资本家和社会名流参加。在会上，美国总统塔夫脱(William H. Taft)作了党内演讲，其中有一段说：

通过我们的国务院，我们对其他所有国家在道德和其他方面的改进常表示同情和关怀。不过国务院在这方面所能做到的事受到了限制，而且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像基督教青年会这一类的运动，就不存在这样的限制。没有人会设想到，我们到中国去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是抱着任何侵略领土或干涉国家内政的野心的。但是有些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能够

在他们本国的政府中取得重要的地位,我已经看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中,凡受过外国教育或其他因素影响的人,很容易获得重要地位。通过这些人,我们就能使这些落后国家最后接受我们的文明和道德标准”。(引自《穆德文集》《Addresses and Papers of John R. Mott》,1947,第3卷,第267—268页)

美国总统塔夫脱所说的这一段话,不打自招地说明了美帝国主义到中国来开办青年会的真正目的。他们企图通过青年会的工作,散布亲美、崇美、恐美的毒素,培养一批买办奴才为它服务,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掩盖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面目。

在那一次的白宫会议上,穆德提出了一个向远东和拉丁美洲扩张的预算,目标是一百五十多万美元,计划在十个国家建盖四十九座会所,其中有八所是在中国,包括青年协会大楼,共计四十多万美元,并在三年内派遣五十名美国干事到国外工作。这个预算当场就由到会的大资本家认定三分之二,实际上,在提出预算以前,半数已由洛克菲勒承担了。

穆德环游世界六十八次,旅程达一百七十万英里(这还只是一九三四年的估计)。他的薪金、旅费和私人秘书的费用都是由几个大资本家包干的。四十年中,他从美国垄断资本集团获得三亿美元,差不多所有的国际性基督教团体、许多重要的国际性基督教会议,以及好些为搜集情报而进行的“调查研究”,都是由他经手补贴的。所以有人说,“毫无疑问,穆德的捐款能力,对于教会合一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美国的大资本家还通过穆德投资三千五百万美元,在世界各国盖了七百多座青年会的会所,每年担负经常费五百万美元(这只是一九〇六年穆德所宣布的)。穆德曾公开地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是没有灵魂的,其所以如此“慷慨”,并不是出于什么慈善的动机,而是因为青年会活动的效果完全使它们满意(见《穆德文集》第3卷,第240页)。穆德以能捐款自豪,并常吹嘘自己的一套庸俗的“金钱哲学”。他说:“金钱不止是一种价值的标准和一种权力的

工具,它本身就是积累的力量。它不止是大能,而且有时几乎是万能”(引自 Basil Mathews:《John R. Mott, World Citizen》,1934,第409页)。

一九一三年(辛亥革命后不久),美国总统威尔逊挑选穆德担任驻华大使,在他给当时国务卿布莱安(W. J. Bryan)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心中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现今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活动分子中有许多是青年会的会员,并且也有许多是在美国大学里受过教育的人,直接或间接的基督教影响是很显著地摆在前头,我无须说应当保持在那里。穆德先生是我素识的朋友,他所具政治家的品格,是和我所相识的任何人相等的。他非但对于中国的情形很熟悉,并且也为基督教世界里一切享有盛誉的人所信任。我想拍电报给他(因他在中国),问他是否愿意留在那里代表美国作我们的驻华大使(同前书,第436页)。

穆德没有接受这个委任,然而他并不是什么“超政治”的人。在威尔逊总统的委派下,他曾担任过两次美国政府特派使团的成员,一次是一九一六年去墨西哥,另一次是一九一七年五月(十月革命前夕)去俄国。美帝国主义就这样利用穆德的宗教外衣,对别国人民进行欺骗。十月革命以后,穆德对苏联表现出刻骨的仇恨。他曾说:“我们积极地无条件地对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在上所主张的一切,表示毫不妥协的宣战。”(引自《穆德文集》第3卷,第336页)。

穆德惯于用帝国主义好战的字眼来描绘他的活动。他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当作“教会的战场”和“战略据点”。他把事工计划称为“战略方针”。他把事工会议称为“军事会议”。他把传教说成是“作战”、“占领”、“夺取”、“围攻”、“征服”。他的第一次环球旅行报告就采用了这样的书名:《征服世界的战略据点》(《Strategic Points in the World's Conquest》,1897)。他并不掩饰自己一贯

执行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实质。

关于北美协会对外扩张的计划,穆德很早就提出两个基本论点。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战斗”要在两个“战场”上进行:一个是城市,因为城市是人口和各种势力集中的地方,也是政治、经济和教育中心点,具有“战略”意义。他说:“在所有的国家里,战场是在城市,城市是风暴的中心,也是人口、影响与机会的集中点。城市怎样,国家也就怎样。”(引自《穆德文集》第3卷,第238页)。另一个“战场”是学生或知识青年。一九九九年穆德就指出:“在非基督教国家里有两亿青年,这对基督教国家的青年会是一个何等巨大的责任!你们仔细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这里关系着两亿青年的道德与精神命运,这里要求我们派人去到那些仍在等候上帝律法的三大洲和许多岛屿……是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帮助教会来陶铸和训练未开化种族的青年,为三分之二的人类奠定基督教文化的基石。”(引自《穆德文集》第3卷,第226—227页)我在青年协会就经常听到美国干事灌输这些论点。事实上,青年会在中国的开展,也完全是根据穆德的这种所谓“战略方针”进行的。

美帝控制下的青年协会

我是一九三〇年夏参加青年协会工作的。当时美国干事经常对我说,青年会和教会不同,因为它完全是一个由中国人独立自主的“本色化”团体。外国干事受中国方面的支配,名义上也都称他们为“Fraternal Secretaries”(可译作“友谊干事”)。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那时协会共有干事二十三人,其中外国干事就有八个,一个是英国人,其余都是美国人。美国干事当中,鲍乃德(E. E. Barnett)是“Senior Secretary”(可译作“首席干事”),他是北美协会的驻华代表,也兼任青年协会的副总干事,因此不但全国三十几名外国干事受他调配,协会的大政方针也是由他控制的。鲍乃德还兼任市会组主任,掌管各地城市青年会的联系。在他的办公室

里，雇有一名外国籍的英文秘书，专为他速记、打字，向美国作报告。所有涉及美国干事的档案和经济，都是完全分开的。美国干事的薪金、住宅等待遇都远远超过中国干事；他们除了每年可以到避暑胜地休假以外，每七年还可以全家回国休假一年。在我参加协会以后不久，美国的经济恐慌迫使大部分美国干事被调回国，于是留下的几位都改任区干事，每一个区可以管理两个以上的城市青年会。据说因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服务”的范围可以扩大一些。实际上，这样就可以由少数的美国干事控制更广泛的地区。

过去青年协会使用的语言是英文，无论是开会、谈话、记录，或者写信、发电报、写报告，都是以英文为主。许多正式文件，包括青年协会的规章在内，都是先用英文写成，然后才译成中文的。各个办公室的玻璃门上都将干事的英文姓名油漆在上面。十五位中国干事当中，至少有九位是留美的。凡是出过洋而英文讲得漂亮的，就最有地位而且“发展”前途也大。凡受帝国主义分子所“赏识”的中国干事（包括各地城市青年会干事），工作五年以上的，也有留美的机会，一般是被派到美国某一个城市青年会实习或是担任游行捐募工作。

青年协会内部，主要分为市会组和校会组两个部分。市会组是联系各地城市青年会工作的，校会组是联系各地学校青年会工作的。它称为“协会”而不称“总会”，意思是各地市会与校会都是独立自主的团体，全国的机构只起协作的作用。在我参加协会时，全国共有四十一个市会，一百三十三三个校会（其中一百一十二个学校青年会，二十一个基督徒学生团契），总共会员人数约五六万人。

中国最早的青年会是学校青年会。一八八五年在福州的英华书院和北通州的潞河书院就有美国传教士所发起组织的学校青年会。一八九五年北美协会派遣第一个美国干事来会理（D. W. y Lon）来中国，先在天津组织一个公立学校校际性的学生青年会。一八九六年穆德首次来华，那时国内还只有五个教会学校有青年会的组织，经他到各地布置以后，在短短的三个月当中，就从五个

增加到二十七个。他还把它们代表召集在上海开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当时的译名是“中国基督学塾幼徒会”,由来会理担任总干事,并立即参加世界学盟作为团体会员。此后,北美协会又派遣更多的美国干事来中国。义和团运动以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相继成立了城市青年会。一九〇二年,市会参加校会的全国性组织并扩大成为“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复改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组合”,朝鲜青年会则自行组织总会。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才改用今名“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

城市青年会的会员一般分为两种:凡已入教的基督徒可以参加称为会员(有时称“同宗会员”);非基督徒参加的则称为会友。过去各地市会每年举行“征求会”,又把应征的会员根据交纳会费的多少,分成更多的类别,如“名誉会员”、“永久会员”、“普通会员”等等。做干事的对于每年的征求会感到头痛,因为在这个时候,就是干事们向资产阶级卑躬屈膝、低头作揖的时候。有的市会在征求会时组成许多征求队,请地方上的官僚和资本家充当队长,彼此竞赛,得分最多的授以奖品。有些大官就在自己的机关里下条子,命令所有属员一齐参加青年会,引起了不少公务人员对青年会的反感。青年会的宗旨,虽然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它的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但它的征求会员的制度已经形成了一种庸俗的要钱方式,失去了它所标榜的宗旨和会训的意义。青年会的干事是由董事部聘请的。但是,每年参加年会选举董事的只限于同宗会员,因而聘请干事的权力就完全掌握在这部分人的手里。一九三二年“美国和加拿大青年会国外工作的调查报告”里说:这样做可以“防止共产党人的渗透和最后的控制”。

青年协会的经济基本上是由北美协会担负的。在我最初参加协会时,据说经济已经“自养”了,那是因为协会大楼房租的收入以及每年从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所获得的“捐款”已够维持经常

的开支；至于许多事工的开展，还是在所谓“Special Projects”（可译作“特殊事工”）名义下，由北美协会补助。到了抗战时期，在梁小初担任总干事的时代，协会的经费连同许多市会的经费，又差不多是全部由北美协会担负了。

青年协会的董事都是由各地市会与校会在全国大会中选出的，照章每月举行常会一次。大部分董事都是上海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名义上是来开会，实际上是吃完午饭就走了。总干事提出一些议案，除了有时董事们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以外，无不按照总干事的意见批准通过。每次会议都有美国的首席干事参加，一切讨论也都是用英语进行的。

中国的青年会，一方面是世界协会的团体会员，另一方面又是世界学盟的团体会员，但它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还是北美协会，因此它和北美协会的联系是极其密切的，而且是经常的。一切会议记录和事工报告、旅行报告，都要制成复本寄往纽约，一切重要决定都必须用函电向纽约请示。中国的青年协会，在过去，实质上是北美协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

余日章时代的青年协会

青年协会的第一任总干事是美国人巴乐满(F. S. Brockman)，他是一八九九年由北美协会派来中国的。一九一五年改由王正廷继任。不到一年，因王正廷去北京充任当时的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又改由余日章担任协会总干事，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余日章任协会总干事共有二十年。当我一九三〇年夏参加协会工作时，余日章还是总干事，但从他在青年会的活动来说，已近尾声，因不久他的心脏病复发，不能担任实际工作，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去世。

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称颂余日章为“Patriot, Peacemaker, Prophet”（爱国者，和平使者，先知），并且认为余日章“在任垂二十年，建树极多，使中国青年会蔚然成一伟大运动”。但是从余日章

的一生来看,他是美帝国主义在我国传教事业中培养出来的忠心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典型人物。他是湖北蒲圻人,一八八二年出生于武昌,父亲余文卿是美国圣公会的牧师。余日章在教会的培植下,进了当时圣公会所办的武昌文华书院,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余日章全家跟着美国传教士逃到上海租界避难。第二年局势平静,教会其他人员均回武昌,而美国传教士却安排余日章留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据该校美国校长卜舫济(F. L. Hawks Pott)说:“余日章在学校青年会中,是一员健将”(引自袁访资著《余日章传》第4页)。余日章对美国式的军事训练发生过浓厚的兴趣,经美国军官评判,成绩特优,给予银质奖品。毕业后,美国圣公会主教吴德施(L. H. Roots)将余日章调回武昌,在文华大学附中教书。三年后,又保送入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一〇年底回国,任文华大学附中校长。不久,爆发了辛亥革命,余日章借外国人的力量,在武昌组织红十字会,从事救护伤亡的工作,因而引起了民军统领黎元洪的注意,乃被邀协助军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民国成立以后,余日章到北京参加教育总长蔡元培所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后又参与陈友仁主办的英文《北京日报》的编辑工作。一九一三年一月,余日章被巴乐满安排到青年协会工作。

余日章开始是担任青年协会“讲演部”的主任干事。当时讲演部分为教育、卫生、农林、实验四科,教育科由余兼任,卫生科是美国干事毕德辉(W. W. Peter)担任,农林科是凌道扬担任,实验科是由美国干事饶伯森(C. H. Robertson)担任。帝国主义分子在宣传方面是善于采用一套巧妙办法的。我在年幼的时候,也曾听过饶伯森在长沙青年会的科学讲演,讲台上摆满了各种科学仪器,他在讲解无线电、回转仪、相对论时,又讲又演,使听众又听又看,借以引起听众的兴趣。他借着科学讲演,使人崇拜所谓西方文明与美国生活方式。余日章的教育演讲,也是运用各种模型与图表作辅导,他的讲题如“振兴教育为救国先务之急”、“人才群趋于政治一途的非计”、“德智体三育并重”等,都是意在引人走上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的道路。

在余日章担任青年协会总干事时代,他曾提出青年会以“人格救国”作号召。这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美国青年会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提倡的所谓德智体群四育的翻版。余日章经常谈论中国今日之需要,并不在于海陆军,也不在于兴办实业,而在于人民的道德,故道德是“需要之需要”。他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道德的退化,若非从提倡道德改革人心着手,则一切救国的主张皆等于空谈。”(见上引袁著第48页)很显然,他是要人们安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局面,而不要起来反对帝国主义。

青年协会的办事处设在上海当时的“公共租界”。余日章在租界上颇有一些“名望”。一九二二年,上海总商会等团体推派他与蒋梦麟为“国民代表”参加了美国总统哈定所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而余日章却为英美帝国主义张目,积极主张所谓“调查”。他和美帝国主义分子罗炳生(E. C. Lobenstine)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名义致信租界工部局当局,提出了这个主张。他又从英国邀请何明华(R. O. Hall)到青年协会担任干事,致力于中英间的所谓“和解”工作,企图缓和当时中国人民强烈的反英情绪。他秉承美帝国主义的意旨策动所谓“太平洋国际学会”,挑选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代表。一九二七年,他为蒋介石和宋美龄证婚。后来蒋介石的忠实奴仆黄仁霖成了余日章的女婿,经常作余日章和蒋介石接触的媒介。一九三二年余日章最后一次去美国游说国务卿史汀生,动身以前,蒋介石在南京召见,面授机宜。

余日章时代,青年协会受到英美帝国主义所特别赞扬的有两点:第一,他们说当时协会集中了不少“人才”;第二,协会搞了不少轰轰烈烈的“运动”。青年会本来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工作,过去经常标榜所谓“向前开路”与“适应客观的需要”,余日章就是本着这个需要推行了以下几项所谓:“新事业”。他请了晏阳初与傅若愚到协会推广“平民教育运动”。华盛顿会议以后,余日章还请了

刘湛恩到协会提倡所谓“公民教育运动”，组织了公民教育运动周和公民训练所。他企图通过这类运动，来对抗当时蓬勃发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一九二二年以后，国内开始了罢工的浪潮，余日章请了朱懋澄到协会搞“劳工工作”，推动上海青年会在浦东设立所谓劳工新村，说是“由此而作改良社会之运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余日章请了郑维到协会推动各市会大搞所谓“乡村工作”，并于一九二八年与苏州青年会合作在唯亭山举办一个农村服务的试验场。

青年会虽然不是教会，不做经常性的传教工作，但青年协会却有时组织一些全国性的所谓“布道运动”，穆德和艾迪(Sherwood Eddy)好几次来中国各地“布道”，都是由协会安排的。每到一个地方，通过当地军阀势力的协助，在较大的公共场所连续“布道”，最后叫人签名参加“查经班”，加入教会。一九三四年当日本侵略我国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并在其统治地区造成白色恐怖的时候，不少青年感到彷徨失望，协会就由美国干事尚爱物(E. H. Munson)组织所谓“青年与宗教运动”，于是年秋又把艾迪招来中国，跑遍二十一个城市，进行“青年与宗教运动”。据尚爱物说：“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方案”，在这个“混乱与不安”的时刻，许多人心怀不满，被迫倾向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但是，只有宗教和信奉上帝，才能予以满足。”(见一九三六年二月的英文《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尚爱物文)。

青年会同帝国主义所搞的其他传教事业一样，很早就注意文化工作。一八九五年第一个美国干事来中国以后，在一八九七年就发行了《学塾月报》，后来演变成一九一七年的《青年进步》杂志。这个杂志连续出版了十五年，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方才停刊。这一年，潘光旦在青年协会担任“民族卫生”工作，发行了《优生》、《华年》等刊物。不到一年半又停止。在会务报导方面，市会组从一九二一年起，出版《同工》月刊，校会组从一九二八年出版《消息》月刊。协会自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书报部”又发展成为

“青年协会书局”。一九三四年吴耀宗先生担任编辑,出版了《青年丛书》五十种,内容分社会、宗教、修养及两性四类,还有社会问题小丛书与宗教问题小丛书多种。这些出版物,绝大部分是翻译英美的书籍,而且是有计划地配合“青年与宗教运动”而进行宣传的。

青年会的学生工作

我于一九三〇年七月参加青年协会工作的时候,校会组的主任是吴耀宗。后来吴改任编辑工作,我于一九三五年秋担任校会组的主任。校会组的任务就是联系各地的学校青年会,推动整个青年会的学生工作。究竟学校青年会在过去起了一些什么作用?青年会的学生工作又有些什么内容?我想简略地谈谈自己的经历,来说明这些问题。

我的家庭并不是信奉基督教的。由于我的父亲要为我长大以后找一个“铁饭碗”,就希望我学好英文,准备投考当时在帝国主义管理下的邮局或海关工作。我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将我送到长沙青年会英文夜校学英文。夜校需要四年毕业,我白天也不进什么正规学校,很多时候就在青年会的“童子部”打乒乓,下象棋,还被吸收到“童子养成团”参加各种活动。每星期三晚间在夜校下课以后,有美国干事主领的英文“查经班”,并备有茶点招待。我为了要跟外国人直接学习英语,所以非常热心参加,从不间断。一九二三年,我去庐山牯岭参加青年协会举办的华中区少年夏令营,被协会美国干事郝乐满(R. S. Hall)选派充当全国童子代表,于是年十月到广州出席青年会第九届全国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有机会听到孙中山先生所作的关于人格救国的演讲。他指出青年会要叫四万万人都变成好人格,所以不能不问政治。他接连讲了三四个小时,最后还是由宋庆龄先生怕他过于疲乏,要求他作结束的。

那次全国大会是在广州岭南大学召开的。我记得会议期间还举行过一次纪念梁发的仪式。梁发被称为中国“最早的传道者”,

他是帝国主义所豢养的洋奴，他在临死的时候，还嘱咐他的儿子放弃在中国官府充当译员的职务，“不再为中国人办事，而希望他改在外人处觅一书记、翻译员或行员的位置。”（见麦洁恩著《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第132页）。梁发在当时就曾被广州的居民骂为内奸，然而一百年以后，帝国主义分子却把他的遗骸迁葬在岭南大学的中心，青年会那次开全国大会时并为他举行了纪念会。

那次从长沙和我一同去广州开会的，有长沙青年会董事、信义会牧师祖起舞。在他的安排下，我于是年圣诞节在信义会受洗入教。这时，我正读完青年会英文夜校，由于自己还不到十五岁，就决定继续求学。一九二四年春，我考进湖南醴陵遵道中学（美国遵道会所办）。校长是中国人，但实权却操在副校长美国传教士的手里。学校的大楼上有这么三句话作为“校训”：“为上帝，为教会，为国家”。圣经是必修课程，星期日全体学生排队去遵道会礼拜堂做礼拜。学校里唯一的学生组织是青年会，所有的同学，不管本人是否愿意，都被当作青年会的会员。我担任过青年会的会长，知道一切活动的费用都是校方津贴的。校长、传教士、宗教教员都是青年会顾问。青年会的活动，包括接待新生、举行联欢会、唱诗班、祷告会、辩论会、旅行游戏等等。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醴陵和全国一样，都感到震动和愤慨，爱国的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而我们在学校当局的压力下，不能有什么响应；而且帝国主义分子还指使我们极力防范，唯恐有人“捣乱”，搞垮学校。

后来我升入南京金陵大学，一进校门就受到金大青年会对新生的接待，很快卷入青年会的各种活动。在大革命影响下，金大刚刚换了中国人当校长，宗教也改为选修科，礼拜可以自由参加，青年会的会员也必须经过一番征募手续。但实际上金大还是由美国传教士牢牢地控制着。宗教活动享有许多特权。学校虽然名义上已在中国政府立案，但是我们毕业时，拿到手的却是美国纽约州大学的文凭。

在大革命时期，青年会的学生工作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在